



武陵文库
民族学研究系列

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编

谢国先 著



中国
世界事务出版社



武陵文库
民族学研究系列

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编

谢国先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编 / 谢国先著.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11

ISBN 978-7-5100-7092-1

I. ①人… II. ①谢… III. ①人类学—著作—汉语—
翻译—文集 IV. ①Q98-53②H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5634 号

人类学翻译批评初编

策划编辑 胡一捷

责任编辑 杨力军

封面设计 陈 璐

投稿邮箱 stxsch@163.com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100-7092-1/C·0028

定 价 45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武陵文库》编委会

学术顾问：何耀华 伍新福 陈国安

石 硕 黎小龙 段 超

主 任：何伟军

副 主 任：谭志松 黄柏权 管彦波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祖龙 田 强 刘冰清

许文年 陈和春 陈廷亮

谢国先

总序

李绍明

武陵山是一地理学名词,指我国南部一座山脉,其来源与汉代于此置武陵郡有关。起始于贵州苗岭山脉,武陵系其支脉。发源于梵净山(主峰 2494 米),盘亘于渝湘之乌、沅二江之间,入湘蔓延于澧水之南,止于常德县西境,平均海拔 1000 米左右,为乌江、沅江、澧水分水岭,呈东北——西南走向。

武陵山区一带的民族,在汉代统称武陵蛮,主要指今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带的先民。东汉至宋在沅水上游五溪地区的又称五溪蛮。

武陵郡始置于汉代高帝时,治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于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时移至临沅(今常德西),其后辖境缩小。唐改朗州,又复置武陵郡。宋置朗州武陵郡,寻废。总之,历史上的武陵郡这片区域即今恩施州南部、宜昌市南部、常德市南部、张家界市、湘西州、怀化市大部、铜仁地区、原黔江地区东部这一大片区域。武陵应先有郡名,然后有山名。

现今上述地区主要聚居的少数民族为土家族、苗族、侗族。除此,还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诸如白族、瑶族、布依族等等。当然,汉族仍是此区人口众多的民族。

武陵地区的民族皆有悠久历史,而且世居该地多年,为开辟这片土地贡献甚大。学术界一般认为土家族族源与古代巴人有关,苗族族源与古代苗蛮人有关,侗族族源与古代百越人有关。如今武陵地区完整地具有汉藏语系之下的四大语族的民族,即汉语族的汉族,藏缅语族的土家族,苗瑶语族的苗族、瑶族,以及壮侗语族的侗族。此四大语族下的这些民族长期在此互动交融,形成既有分又有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在其他地区是较为罕见的。

今天的武陵地区,一般而言,土家族主要居于北部,苗族主要居于南部,侗族亦主要居于更南部。当今除土家、苗族的自治州、县外,侗族有芷江、新晃、玉屏、靖州、通道、三江、龙胜、通道等单独或联合的自治县。元明清时期以来,土家族有较大的土司,完整的政权形式;苗族仅有较小的土司及不甚完整的政权,侗族有一些中等土司,政权较完整。从民族互动而言,长期以来,土家与苗关系密切,尤其是魏晋以来,盘瓠种人多势众,故中原人以为武陵、五溪皆为盘瓠种的人群。而元明以来,由于中央王朝“以夷制夷”,多以土家土司以统苗众,至于侗与土家亦有密切关系,自五代宋末以来,一些侗族土司北上统治了武陵南沿一些地带,长此以往,有一些亦融合于土家之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即明末清初武陵地区改土归流,废除“蛮不出峒,汉不入境”限制。土家地区大量吸收了汉文化。而苗因居深丘,原社会经济较为特殊,受汉文化影响较少,其民族特色保留较多。惟有侗族所受汉文化涵化,介乎二者之间。不如土家,而较苗民为深。

若就文化多样性而言,武陵地区三大少数民族文化亦各有特色。土家、苗、侗均有自身独特文化,但此三族的文化又有相互交融的现象。且呈现出地域不同的变异,武陵地区有三条江穿流其间,鄂西的清江,湘西的沅江,黔东南和渝东南的乌江,此三江流域所在的三族既有民族的共同性,又有地域的差异性。比如,土家族所谓“北跳丧,南摆手”。即以清江与沅江(含酉水)流域有所区别,而乌江流域,尤其是酉阳、秀山一带,既有摆手,又有跳丧。在原黔江地区与鄂西地区,土家与苗互通婚姻,彼此界限愈模糊,只有从姓氏方面遗留一些痕迹。唯有湘西腹心地区的土家族与苗族文化特色较为突出。

武陵民族文化研究,可以从多学科多视角出发,仅以一级学科的民族学和社会学(含二级学科的人类学)而言,基础研究仍然相对薄弱。20余年来,可以说武陵民族区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已经步入正轨,但相对而言,基础研究仍然不够。比如,迄今为止仍无此区域宏观的民族志著作,仅有一些中观或微观之作。即令如此,能够称之为范式的民族志或民族学、人类学著作,仍然不多。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涉及学科的根本,也涉及对这一区域科学认识,一切均应从此入手。否则,其成果即成无本之木或无源之水。个人认为,这是武陵民族区域研究仍须注意之点。

其次,许多学科都有其应用部分即学以致用。民族学、人类学尤其如此。民族学研究对象是民族及其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着重于民族文化遗产与调适研究,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近期国家倡导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刻不容缓的事。带有抢救性质,是传承民族文脉的大事。今后仍须努力。当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还有许多现实的重大课题。这在武陵民族地区都需要大家不断努力。

三峡大学是武陵民族地区的一所高等学府,面对中部崛起的大好机遇,肩负着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重任。该校武陵民族研究院组织编辑出版武陵文库,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武陵文库从多角度、多层面展示武陵地区调查资料和学术成果,以便让外界进一步认识它,了解它,支持它的发展。同时对推进武陵民族地区的学术研究和民族学科建设,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总之,武陵地区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而言,是一个富矿。希望有识之士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问世!



序

谢国先教授是我神会已久的朋友，虽很少见面，可通过邮件来往，得知他多年来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做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人类学和民俗学专业领域里的“翻译批评”。我很为他求真、求实、善意、坦诚，一门心思执着于“翻译批评”的精神所感动，觉得他就是学术界的一位“愚公”，那份纯粹的学术理念令人肃然起敬。

我本人可能是最不适合为本书写序的人，因为英语水平太差而难以对他从事的“翻译批评”做出具体、贴切的评论，我也没有从事过将英文的人类学文献翻译成汉语的相关工作。之所以犹豫再三却决意为“翻译批评”写下这些话，除了我认同他对学术的信仰，感佩他为学术进步所做的努力，主要还因为我是人类学译著的热心读者。学习人类学，最理想的当然是阅读原典，但对于接触不到原著、读不了原典或读起来非常吃力的“学徒”来说，通过译著去了解海外人类学先贤大师们的思想与智慧，自然是绕不开的路径。正是因为有了译者们呕心沥血的翻译劳作，读者们才有可能共享人类学积累的那诸多学术财富，因此，拜读人类学译著，实在是开心惬意之事。作为读者，我对人类学译著的译者心怀敬意，感激人类学译著的出版并相信它们有可能带给读者的启示。举凡学习过任何一门外语和人类学的人，都深知人类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难，也多少都能体会到在任何一部学术译著中译者均需付出很多辛劳。尤其是要将那些遥远世界的民族志作品，翻译成“信、达、雅”的中文译著，使之成为中国人类学乃至整个知识界的基础性文献，其贡献之大、其创造性翻译的价值之宝贵，实在是怎么评价也不过份的。

毋庸讳言,在中国知识界以及社会科学、人文学术的很多领域,很久以来为翻译作品的质量问题所困扰,乃是不争的事实。这个问题相当普遍,时不时也会成为话题,可绝少有人想着要去彻底纠正它,更少有人愿意认真地去做法学界很可能视之为边缘性的、甚或“吃力不讨好”的“翻译批评”。就此而言,我想说中国人类学界非常幸运,因为有谢国先教授通过辛勤的检验和校讎,指出了正在市面上流通的人类学译著的一些错误,这对于读者来说真的是一件好事情。作为读者,在向译者表示敬意之后,更应对谢教授表示敬意。

在我粗浅的理解中,人类学的“翻译批评”,应该主要涉及异文化民族志理解上的“误读”等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有译者再对谢教授的“翻译批评”回应以“反批评”,那么,中国人类学界对于人类学史上那些名著的理解、对于异文化民族志翻译中诸多学术焦点的探讨,自然就会深入很多。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人类学界提高学术翻译的水准,也会有助于补强人类学同行们在学术史和学术理论方面的基础。可如果在谢教授不辞辛苦地为人类学译著纠正的错误中,有太多的部分属于“明显而简单”的错误,甚至很多是在翻译界看来不值一评的问题,那就委实令人遗憾,值得中国人类学界反思了。长期以来,由于人类学知识积蓄的非均衡性,一个时期内国内学术市场对人类学译著的需求颇为旺盛。于是,在市场短缺而读者又处于饥渴状态的前提下,人类学译著的出版自然是一派繁荣。然而,其中还是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品质问题。谢教授认为,即便是有些错误太没有学术性,也总得有人告诉读者哪些地方错了,以免他们被误导。我觉得,正是这种不妥协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向我们提示着“翻译批评”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也向我们提示着学术的尊严和学者、译者该有的执著。由于我自己偶尔也可能成为译者(在日语和汉语之间),因此,我要深深地感念谢教授来自“翻译批评”的警示。

谢教授致力于从事的人类学“翻译批评”,无疑有深刻和重要的学术意义。我们不妨把“翻译批评”视为是谢教授在中国人类学界勤奋耕耘的方式之一,也是他以对学术高度负责的态度为中国人类学做出的贡献。谢教授通过其“翻译批评”的学术实践,在中国人类学界开辟了一片新的学术空间,并已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收获。例如,他提出了中国人类学应该进入“后翻译时代”的命题,敦促人类学界应重新审视人类学翻译的重要性,译者应严肃对待翻译并秉持必要的翻译道德,人类学界则应开展必要的翻译批评,并对人类学译著有恰如

其分的评价。谢教授还注意到人类学翻译中的译名问题与译者的修辞权力等问题。就“译名”而言,确实有些译者对人类学界已经逐步达成共识的“译名”或“术语”弃之不用,不经任何说明与讨论便大量创造新“译名”,从而导致不应有的混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固然需要尊重原著作者,但对自身在译文表述中的“权力”也应该有所觉悟和警惕。译者应该清醒地理解原著各自的学术背景和时代烙印,切实意识到它们同时还是当时或当前世界学术体系中话语权、表述权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结构不均衡的产物,而不应无原则地吹捧、拔高原著。我倒是觉得,日本人类学有一点经验或许可以借鉴,那就是大多数译著均要附加详尽、专业和高水准的“解读”或“解说”,以帮助读者避免无谓的“误读”。这就要求译者除了推出译文,还必须研究成为翻译目标的原著,并有义务向母语读者“解说”译著的内容、价值、翻译过程遭遇的问题以及译者是如何斟酌处理的。此外,很多译著还附有详细的译名对照表或索引。只有这样,一个译者才算是负责任地完成了学术翻译的任务。

谢教授通过“翻译批评”,还坦率指出了“作坊式的译本生产模式”存在的问题。的确,如果把翻译看作是学术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则一个“老板”加几位“学生”的模式确有值得反思之处。在本科或研究生、博士生的人类学教学工作中,为培养人才、敦促学生读书尤其是阅读原著的意义上,这种做法有其必要性,但由此产生的译本应该只是“征求意见稿”,需要在课堂上历经好几届同学的反复切磋、质疑和讨论,然后再经“老板”认真统稿,尤其是在斟酌译名、统一格式并写好“解说”之后,才适宜作为译著推出。假如“老板”在出版社获得出版机会,又对翻译的习作把关不严,而学生们钻研原著不够精到,缺乏敬畏学术之心,出错也就在所难免。1986年前后,我自己曾负责过一本译自日语的人类学译著的统稿。其间因为译名、格式和译文风格等问题而深感苦恼的记忆,至今依然深刻地留在脑海里。1995年夏天,王筑生教授来京参加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时曾告诉我说,他在决定去美国留学攻读人类学之前,曾经读过那本于1988年出版的由我负责统稿的《现代文化人类学》并受到启发。我深知那本译著也多少存在一些瑕疵,但既然承担统稿,则一切责任在我。多年以后回顾它,实在是会汗颜。尽管来自日语的人类学译著远不及来自英语的译著那么重要,可一旦身为译者出版了译著,就需要对读者永久性负责,岂能不慎之又慎?

谢教授的一项课题“最近30年人类学英文论著汉译质量分析”,不久前已

经获得教育部批准,令人深感欣慰。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翻译批评”的学术价值得到了认可,也表明今后一段时间内,谢教授仍将坚持进行“翻译批评”。他曾经说过,“至少会坚持到人类学翻译质量发生明显好转的时候”。我由衷地希望这个过程越短越好,比起要麻烦谢教授去为那些只是因为不够认真和敬业才出现的低级错译花费太多纠正的功夫,我更为期待谢教授的“翻译批评”今后能够深入一步,去讨论和分析人类学翻译甚或广义的异文化传通过程中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诸多关键性课题。毫无疑问,人类学的学术研究是可以商榷的,人类学的学术翻译也是可以批评的。假如它们不能被商榷和批评,那就说明其本身尚不足以成为学术。我相信,谢教授的“翻译批评”,将在中国人类学的进步:从幼稚、肤浅迅速地迈向成熟与深刻的发展历程中刻下一些清晰的烙印,并为读者、后学所感怀。

周 星

2013年10月7日

写于爱知大学研究室



目 录

Contents

序.....	001
中国人类学应该进入后翻译时代.....	001
《努尔人》汉译问题讨论.....	007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汉译问题讨论.....	045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汉译问题讨论.....	109
后 记.....	187



中国人类学应该进入后翻译时代^①

人类学于 19 世纪在欧洲逐步发展起来。20 世纪初期,中国人类学在借鉴欧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得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最近 30 年以来,我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日益兴盛,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些成就与翻译引进欧美国家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和现实。但是,目前中国人类学翻译的质量普遍不高。为便于总结历史,开创未来,可以称此前为中国人类学的翻译时代,称此后为中国人类学的后翻译时代。

中国人类学翻译时代的翻译产品数量众多,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首先,个别研究者没有充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混淆著译关系,甚至把原著内容搬入自己的著作中而不加以注明。这个现象从中国人类学产生时起到现在,一直都存在。这已经超出单纯的翻译论题,本文不予讨论。其次,中国人类学翻译时代的翻译质量普遍不高,尤其是最近 20 来年,译作质量甚至有下滑趋势。本文将举例说明这一点。

英国人类学家阿兰·巴纳德所著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是一本朴实平易的大学教材^①,汉译本题为《人类学历史与理论》^②。这个译本中误译之低级和普遍,令人难以置信。有些误译虽仅涉及个别单词,但它们可能严重误导读者。如:

将 American South Asianist(美国的南亚学者)误为“研究南非的美国人”;^{[2] 91}

将 exploration(探险)误为“剥削”;^{[2]105}

将 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仇犹太主义)误为“犹太主义”;^{[2]110}

将 ethnoscience(民族科学)误为“田野民族志”;^{[2]148}

将 South America(南美)误为“南非”;^{[2]148}

将 participant-observation(参与观察)误为“观察参与者”;^{[2]155}

将 postmodernism(后现代主义)误为“后结构主义”;^{[2]175}

① 本文为教育部 2011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最近 30 年人类学英文论著汉译质量分析”(11YJAZH105)阶段性成果之一。

将 formal(正式的)误为“以前的”;^{[2]177}

将 post-structuralist(后结构主义者)误为“结构主义”;^{[2]178}

将 Yapese(雅浦人)误为“雅皮士”;^{[2]185}

将 deconstruct(解构)误为“结构”;^{[2]198} 等等。

单词误译也可能导致整个句子面目全非,现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例一,“他提出,‘在生物学留下的空虚中,欺骗整个人类学。’”。^{[2]146} 译文所谓“欺骗”,原文为 lies(存在)。原意为“如他所说:‘整个人类学就存在于生物学留下的虚空中。’”这句话说,在生物学无能为力的那些方面和领域,人类学发挥作用。同书下一段话也说,虽然社会生物学在生物学界可能有很大影响,但却从未成功地取代人类学。

例二,“他们说,好的历史是‘历史性的’(historicist),’要有一种非常精确的世界感。”^{[2]194} 译文中所谓“世界”,原文为 word(词)。原意为“他们说,好的历史是‘历史决定论的’——就‘历史决定论的’这个词的准确意义而言。”

例三,“按照哈里斯的说法,文化是‘自由基因’(gene free)”^{[2]146}。原文中的 gene free,不是“自由基因”,而是“不受基因决定的”。社会生物学认为生物基因在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人的文化无非是人的动物本性的产物。哈里斯则认为不能用基因解释文化。这句话可以翻译为:“如他(哈里斯)所说,文化是‘不受基因决定的’”。

此外,由于对个别单词乃至整个句子、整段文字的误会,《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歪曲了摩尔根、博厄斯、列维·斯特劳斯、拉德克利夫·布朗、埃文斯·普理查德等多位人类学家的思想。遗憾的是,这个译本却被当作大学教材推荐给了中国读者。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辑的论文集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3] 汉译本题为《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以下简称《写文化》)。^[4]其中个别译者的草率翻译同样歪曲了作者的思想。现举例说明。

例一,“经验性的‘我曾在那里’树立起人类学家的科学权威。”^{[4]295} 原意实为“出于经验的‘我曾在那里’这一要素确立人类学家独一无二的权威;文本中对这一要素的隐瞒确立人类学家的科学权威。”这是克利福德所说的人类学权威赖以建立的两条文本之腿:一是表明他在场,二是装作他不在场。他在场,所以他有发言权(别人不在场,所以别人就没有发言权);装作他不在场,所以被调查者的言

语和行为都没有受到干扰,是自然的而非故意表演的(人类学家搜集到的资料是可靠的)。《写文化》把展示两条文本之腿的两个分句截头去尾,拼接成一句话,彻底歪曲了原文含义。^{[5]262}

例二,“随着‘研究的开展’,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比我可能有的更舒适的位置上,我是代表着支配或者边缘群体而‘发布声音’。”^{[4]311} 译文所谓“随着‘研究的开展’”,原文为 by ‘studying up’ (通过向上研究)。全句说“通过‘向上研究’,我发现,与我假如代表被统治群体或边缘群体‘发出声音’所可能获得的位置相比,我现在处于一个更为舒服的位置上。”这句话中的“我”是保罗·拉比诺。保罗·拉比诺的民族志将上层群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像传统民族志那样研究底层群众。“向上研究”,也就是研究统治者、决策者。^{[5]268-269} 这正是保罗·拉比诺独特的研究取向,但却被《写文化》完全忽略了。

例三,“第三个术语:主体,集中在一个权力场域中离开力的直接应用最为遥远的向度上。”^{[4]311} 译文所谓“主体”,原文为 subjection (服从)。原意为“第三个术语,即服从,关注权力领域中与武力的直接使用最不相干的那个方面。”^{[5]270} 既已“服从”,当然再无必要借助武力去征服,但《写文化》把 subjection (服从) 误译为“主体”,就使整句话不知所云。

各种各样的翻译错误或简单或复杂,总是妨碍读者理解作者的思想。许多原著可称为经典,但其汉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之处,因此,经典在译本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很可能会因为译本而遭损害。

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著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6] 汉译为《文化的解释》,在中国人类学界影响巨大。格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描述给人印象深刻,但就是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这一部分,汉译本中也有很多错误。现略举数例。

例一,“……通过敲击一个破裂的锣标志其开始和结束。”^{[7]496} 这个“破裂的锣”也被译者简写为“破锣”:“……当一声破锣响起时,参赛的公鸡被放进场,搏斗由此开始。”^{[7]504} 巴厘岛上的斗鸡活动具有象征意义:格尔茨认为参斗的公鸡是巴厘男人的象征。如此重要的活动却要使用“破锣”来宣告其始终,未免使人生疑。其实,“破裂的锣”也好,“破锣”也好,都是误译。原文中,这个乐器是 slit gong。slit gong 也叫 slit drum,应译为“开口木鼓”,“木鱼”,或“梆子”。这种乐器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都可以见到。在我国,佛寺敲打的木鱼、佤族使用的木鼓,均属此类。这类乐器确实是在或长或短的树干上打开一纵长的口子(甚至

掏空)做成的,但故意造成的开口与“破……”没有关系。

例二,“……甚至时不时地罚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热带的阳光下晒一天作为儆诫,但从未听说过发生人员的死亡,即使在非常非常偶然的情况下。”^[7486]原文说,警察让违反斗鸡禁令者在热带烈日下曝晒,个别情况下还晒死了人,然而教训还是没有被汲取,但误译却说从来没有晒死人,这就使得原文的意图落空:格尔茨想用可能致死的严厉惩罚的无效来反衬巴厘人对斗鸡的迷狂。这句话中,警察的惩罚是否曾致人死亡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句话可以翻译为:“……甚至不时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热带的太阳底下晒一天,用活人做教材,但是,不知为什么,即使偶尔,极为罕见地,把人晒死了,这类教训也从未被汲取。”

例三,“这是一个事实,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距铁还绑在受伤者身上,那么进攻者仍会受到它的受伤对手的攻击。”^[7497]原文的基本结构和根本含义都被译者弄错了。不存在“如果距铁还绑在受伤者身上”这个假定,因为在斗鸡的全过程中,每只斗鸡腿上所绑缚的距铁并不会因为自己受伤或对方受伤而取下。同书前页有句译文:“负责捆扎距铁的人也提供这种刀,如果他所帮助的鸡赢了,鸡的主人就会把败鸡带着距铁的腿给他作为奖赏。”^[7496]这句译文也表明斗鸡过程中不存在取下距铁这回事(否则,就没有“败鸡带着距铁的腿”这个说法)。上例误译可以改译为“如果距铁刺进受伤者身体里——这种情形经常发生——两只斗鸡确实就会搏斗而死,因为那样一来进攻者就会受其负伤对手的摆布。”道理很简单:如果进攻者腿上绑缚的距铁刺进受伤者身体里,受伤者的挣扎就会使进攻者自己的身体失去控制。格尔茨细致的描写在译文中完全变了样。

中国人类学译作中漏洞百出,原因很多。本文不拟对之进行细致分析,仅指出其中一些较重要者,以期引起学术界注意。

第一,翻译活动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人类学翻译的目标是尽可能忠实地将作者的思想传达给读者。作者大多是不懂目的语的外国人,且多享有较高学术地位,译者对他们应该怀有一点敬意,而不要曲解他们的思想。读者因为某种原因不能阅读原著,于是依靠译本理解作者(而不是译者)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是弱势群体,译者应该对他们抱有一点同情,而不要误导他们。只有把作者的思想忠实地传达给读者的译本,才能算是尊重作者、同情读者的合格译本。对作者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同情,是基本的翻译道德。翻译能力的提高和翻译态度的改善均应以正确的翻译道德为基础。

即使将译本作为商品看待,译者和出版社也应满足提供合格产品这一基本要求。

然而,中国人类学界的译者并不都是具备基本翻译能力的人,甚至可以说,某些译者原本就是基本不具备翻译能力的学生。最近这些年,一位教授(俗称老板,类似于作坊主)加数位干活的研究生(类似于学徒)所构成的翻译团队越来越常见。这种作坊式译本生产模式把作为教学训练的翻译活动与作为学术实践的翻译活动混为一体,把有待批改的学生作业当作合格的翻译产品推向社会。译者队伍的杂乱导致一流学者的经典原著大多转变为中国学生的翻译练习。遗憾的是,这种生产模式的弊端不仅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相反,在培养人才的借口下,这种生产模式还有被延续的趋势。

个别极其糟糕的译本证明,中国人类学的翻译时代还存在不懂装懂、胡译乱译的恶劣行为。

第二,译者的自我圣化与学术界对翻译活动的轻视。一方面,翻译机会的获取使得译者从缺乏此机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具备特别的研究条件、怀有优越的自我感觉的群体。翻译活动因此成为这个群体的优势地位的标志。于是,译者下笔之时并未充分考虑作者是否会被误解,读者是否会被误导,而更多关心如何利用翻译这一“特权”,及时确立自己的译者身份,向学术界宣告自己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与其他学术活动相比较,翻译向来不被学术界重视。这种反差也可能导致译者对翻译活动抱着积极欲为而又不愿尽力而为的矛盾态度。

第三,中国人类学的翻译时代缺乏系统的翻译批评。翻译批评有利于增进对原著的理解,可以促使虽有明显缺陷但仍然为读者所需要的译本尽快得到修订,改正错误,提高质量。更为重要的是,翻译批评可以让译者切实感受到学术质疑的压力,提醒译者在通过翻译获取利益的同时,不可忘记他首先应该考虑如何提供合格的译文,从而表明他愿意遵守基本的翻译道德。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因为缺乏系统的翻译批评,所以译者对译本进行自我修正的可能性不容易变为现实。以《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为例,^[9]该书1996年初版中的绝大多数实实在在的翻译错误在2004年第3版中仍然存在。^{[9]17-340}这个例子也说明,如果仅有个别批评者发出微弱的声音,就不可能起到振聋发聩、立竿见影的作用。

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既非貌似神圣的灵媒,也非徒知搬运的蜂蚁。译者,尤其是人类学著作的译者,对于增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了解甚为重要,因为人类